



我们曾经年轻

为一代人立言，不是由局外人，
而是由我们自己去评说自己的历史。

董宏猷 主编



中国知青文库
生命之歌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知·青·回·忆·录

我们曾经年轻

为一代人立言，不是由局外人，
而是由我们自己在评说自己的历史。

董宏猷 主编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曾经年轻/董宏猷主编.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5
中国知青文库生命之歌
ISBN 978-7-307-10696-3

I. 我… II. 董… III. 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9486 号

责任编辑:聂勇军 责任校对:刘欣 版式设计:马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4.375 字数:323千字

版次: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0696-3 定价:26.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编 委 会

主 任 张福臣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邓 贤 叶 辛 白 描 刘小萌

刘晓航 陆天明 张承志 张福臣

肖复兴 岳建一 胡发云 姜汉芸

晓 剑 郭小东 高红十 董宏猷

谢春池

谨 以 此 书

献给

活着和死去的知青伙伴们

以及

他们的父母、亲友、老师

他们所眷恋的父老乡亲

他们生命历程中的爱护者关注者

他们生命的延续——

所有知青的孩子们

总 序

叶 辛

40 多年前，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波澜壮阔”四个字，不是我特意选用的形容词，而是当年的习惯说法，广播里这么说，报纸的通栏大标题里这么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年还是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这一说法，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强调，而是天天在我们耳边一再重复宣传的话，以至于老知青们今天聚在一起，讲起当年的话语，忆起当年的情形，唱起当年的歌，仍然会气氛热烈，情绪激烈，有说不完的话。

说“波澜壮阔”，还因为就是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和召唤之下，1600 多万大中城市毕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村，奔赴边疆，奔赴草原、渔村、山乡、海岛，在大山深处，在戈壁荒原，在兵团、北大荒和西双版纳，开始了这一代人艰辛、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

讲完这一段话，我还要作一番解释。首先，我们习惯上讲，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 1700 万，我为什么用了 1600 万这个数字。其实，1700 万这个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的权威统计，应该没有错。但是这个统计，是从 1955 年有知青下乡这件事开始算起的。研究中国知青史的中外专家都知道，从 1955 年到 1966 年“文革”初始，十

多年的时间里，全国有100多万知青下乡，全国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都在这个阶段涌现出来，宣传开去。而发展到“文革”期间，特别是1968年12月21日夜間，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那个年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且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不过夜”。于是乎全国城乡迅疾地行动起来，在随后的10年时间里，有1600万知青上山下乡。而在此之前，知识青年下乡去，习惯的说法是下乡上山。我最初到贵州山乡插队落户时，发给我们每个知青点集体户的那本小小的刊物，刊名也是《下乡上山》。在大规模的知青下乡形成波澜壮阔之势时，才逐渐规范成“上山下乡”的统一说法。

我还要说明的是，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根据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的实际数字统计的，比较准确。但是这个数字仍然是有争议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数字，没有统计千百万回乡知青的数字。回乡知青，也被叫作本乡本土的知青，他们在县城中学读书，或者在县城下面的区、城镇、公社的中学读书，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读到初中毕业，照样可以考高中；他们读到高中毕业，照样可以报考全国各地所有的大学，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样，不会因为他们毕业于区级中学、县级中学不允许他们报考北大、清华、复旦、交大、武大、南大。只要成绩好，名牌大学照样录取他们。但是在上山下乡“一片红”的大形势之下，大中城市的毕业生都要汇入上山下乡的洪流，本乡本土的毕业生理所当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乡村里去。他们的回归对政府和国家来说，比较简单，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回到父母身边去，那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家。学校和政府不需要为他们支付安置费，也不需要为他们安排交

通，只要对他们说，大学停办了，你们毕业以后回到乡村，也像你们的父母一样参加农业劳动，自食其力。千千万万本乡本土的知青就这样回到了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里。他们的名字叫“回乡知青”，也是名副其实的知青。

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乡知青，和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要离开从小生活的城市，迁出城市户口，注销粮油关系，而学校、政府、国家还要负责把他们送到农村这一“广阔天地”中去。离开城市去往乡村，要坐火车，要坐长途公共汽车，要坐轮船，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长沙的知青，有的往北去到“反修前哨”的黑龙江、内蒙古、新疆，有的往南到海南、西双版纳，路途相当遥远，所有知青的交通费用，都由国家和政府负担。而每一个插队到村庄、寨子里去的知青，还要为他们拨付安置费，下乡第一年的粮食和生活补贴。所有这一切必须要核对准确，做出计划和安排，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离开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还是有其依据的。

其实我郑重其事写下的这一切，每一个回乡知青当年都是十分明白的。在我插队落户的公社里，我就经常遇到县中、区中毕业的回乡知青，他们和远方来的贵阳知青、上海知青的关系也都很好。

但是现在他们有想法了，他们说：我们也是知青呀！回乡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不少人觉得他们的想法有道理。于是乎，关于中国知青总人数的说法，又有了新的版本，有的说是2000万，有的说是2400万，也有说3000万的。

看看，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一个十分简单的统计数字，就要结合当年的时代背景、具体政策，费好多笔墨才能讲明白。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还有多多少少类似的情形啊，诸如兵团知青、国营农场知青、插队知青、病退、顶替、老三届、工农兵大学生，等等等等，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字眼，今天的年轻一代，已经看不甚明白了。我就经常会碰到今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的种种问题：凭啥你们

上山下乡一代人要称“老三届”？比你们早读书的人还多着呢，他们不是比你们更老吗？噢，你们怎么那样笨，让你们下乡，你们完全可以不去啊，还非要争着去，那是你们活该……

有的问题我还能解答，有的问题我除了苦笑，一时间都无从答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黄土地之歌”、“红土地之歌”和“黑土地之歌”系列作品这一大型项目，实在是一件大好事。既利于经历过那一时代的知青们回顾以往，理清脉络；又利于今天的年轻一代，懂得和理解他们的上一代人经历了一段什么样的岁月；还给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记忆。

对于知青来说，无论你当年下放在哪个地方，无论你在乡间待过多长时间，无论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业绩还是默默无闻，从那一时期起，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呼：知青。这是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记。

历史的巨轮带着我们来到了2012年，转眼间，距离那段已逝的岁月已40多年了。40多年啊，遗憾也好，感慨也罢，青春无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罢，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人生的过程，40多年里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或将永久地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风雨如磐见真情，

岁月蹉跎志犹存。

正如出版者所言：1700万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虽谈不上“感天动地”，但也是共和国同时代人的成长史。事是史之体，人是史之魂。1700万知青的成长史也是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不可遗忘，不可断裂，亟求正确定位，给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给昨天、今天和明天一个交待。

是为序。

再 版 序

董宏猷

《我们曾经年轻》即将再版了。这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情。

当这本“武汉知青回忆录”再次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回忆录的作者们，大部分已经进入了老年。有的作者，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其中，就包括本书编委会的编委廖世昌先生，刘中桥先生。世昌先生不仅是我总工会的同事，而且，还是我中学的校友，当然，当他读高一的时候，我才是初一的新生。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清秀的斯文的高中生，住在汉口的老街巷中，离我家也不远。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世昌也是热心而认真的。遗憾的是，世昌与中桥再也看不到本书的再版本了。想起他们，想起书中那些离我们而去的朋友，我的心中充满了怀念。

《我们曾经年轻》初版本的编撰、出版过程，是一

次难忘的人生旅程。在我的写作与编辑的生涯中，从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曾经年轻》那样，有那么多的朋友因此而聚集在一起，而且，在书籍出版之后，还继续“我们”着，“年轻”着，成为志趣相投的同志与挚友。因此，这本回忆录，是整整一个团队的共同结晶。为了完成“武汉知青回忆录”这样一个宏大的工程，一批知青朋友组成了编委会。本书初版的编委会的编委是：方明、王心耀、刘中桥、刘晓航、孙军胜、余熙、李东、李勇、李家容、肖新富、周积明、胡发云、姜汉芸、赵林、郭齐勇、袁善腊、徐世立、杨卫东、揭书安、廖世昌、管康平、樊星、董宏猷。其中，方明、刘中桥、刘晓航、李家容、周积明、胡发云、姜汉芸、廖世昌、管康平、樊星、董宏猷等为执行编委。承蒙大家厚爱，推举我为主编。其实，给予我们大力支持的，是那些默默的幕后的朋友们。为了尊重历史，尽量反映武汉知青当年下乡的全貌，保留知青回忆录的原生态，我们在时间的纵线上，囊括了11年中首批下乡知青与最后一批下乡知青的回忆；在地域的宽度上，包括了武汉知青所到达的山区、平原、水乡、农场等。在回忆录的选取中，我们曾经收到过用铅笔写在小学生作业本上的稿件。因此，写作者的身份越是最普通的劳动者，越是受到大家的重视与青睐。同时，我们还邀请了一批不是知青的作家学者，撰写了如何看待知青的文章，力争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待这场在20世纪延续了10年之久的将全国的青年强制迁徙到农村去的运动。在整个编辑出版的过程中，编委们都付出了无私的奉献。回想那些集体讨论、集体审稿的过程，心中至今仍感温馨。

有意思的是，因了这本书的编撰，派生出一个特殊的艺术团体：“武汉知青之友艺术团”，并且，组织排演了一台具有历史意义的晚

会：纪念知青上山下乡三十周年大型歌舞晚会，主题就是：“我们曾经年轻”。晚会的主题歌《我们曾经年轻》，不仅在晚会上唱响，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传遍了全国，而且，还传唱到海外，成为中国知青的代表曲。直到今天，当《我们曾经年轻》的乐曲响起，两鬓斑白的老知青们，顿时就会青春焕发，热血沸腾，变成蓄着瓦片头的小伙子，扎着麻花辫的小姑娘。

其实，人生自古谁无青春？不论是我们的前辈，还是我们的后辈，无一例外，都会追忆逝去的青春。王蒙先生有过《青春万岁》的激情呐喊，赵薇女士刚刚执导了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但是，从来没有哪一代人，会像中国知青那样，拥有如此相同的青春岁月，拥有如此相同的痛苦与磨难，以及生命与灵魂的炼狱。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中国的知青事件，都将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历史文本。而且，值得研究的是，这样一个无比庞大的经历各异的见识纷呈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但却拥有“共名”的群体，对青春的留恋期亦或是自恋期竟然如此的漫长，几乎要用一辈子来咀嚼自己无法选择的青春，而且，随着这批人逐渐的老去，逐渐的消逝，这样的青春回忆便显得愈发的迫切。这是为什么？难道仅仅是这一代人顽强的生命的自恋与矫情吗？

这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

也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迄今为止，关于知青，已经有够多的回忆，够多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对知青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诠释了。而且，关于“青春无悔”与“青春要悔”的讨论，也一直在不间断地进行着。但是，我认为，迄今为止，关于知青的研究，远远没有穷尽。这是因为，在一个相当

长的历史时期，“知青”奇怪地变成了“敏感”的词语，“知青”及其生发的那个时代，无形中成为一片潜藏着危险的沼泽，让研究者们走着走着便望而却步。当然，有一条小路，是留给研究者和写作者的，于是，这条被默许的小路，便成为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关于“知青”的诠释，包括理论的，以及艺术的。于是，久而久之，这条小路，极有可能被视为“知青”的主流和全部诠释，而传之后世；而那丰富的原生态的汪洋大海一般的“沼泽”，则会被悄悄地遮蔽，消逝在历史的深处。因此，不论是对知青的简单化、粗鄙化甚至是妖魔化，都是我们今天还活着的知青所无法接受的。倘若我们任凭那些有意或无意的笔触在我们的脸上画个大花脸，而我们却沉默无语，那么，就意味着对大花脸的默认。这不仅是对尚且活着的知青的不公，同时，更是对那些死去的同学与战友的亵渎。因此，直面我们共同经历的那段历史，正视、反思、研究那段历史，更重要的是，在一个盛行戏说历史的时代，在一个习惯遗忘的国度，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为人类的文明史，真实地记录、描述、建构中国的知青史，便成为我们的责任，成为历史赋予我们的重托。没有别的，因为我们曾经年轻，曾经有过那样的青春，而现在，我们还活着，尽管我们大多数已经白发苍苍，进入老年，但是我们无法逃避。因为我们看到的有关知青以及知青运动的种种介绍，尤其是各种文艺作品、文学作品所累积而形成的历史镜像，正在不知不觉中构造了关于知青生活的诸多印象和概念。不要小瞧这些印象和概念，即使是片面的，表面的，肤浅的，甚至是互相矛盾而混沌着的，多年以后——甚至就是今天，它们就是关于知青历史的标准答案，而这样的标准答案，将会提供给我们的孩子们以及子孙后代们。可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却对孩子们说，不！不是

那样的！至今为止，关于知青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于是孩子们天真无邪地望着我们，问道，爷爷，奶奶，你们说说，知青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孩子们需要我们回答。

未来需要我们回答。

历史需要我们回答。

于是，我们这些历史的当事人，不再年轻的见证者，用我们仍然燃烧着的青春激情，用我们历尽沧桑的理性精神，用我们敢于担当的历史责任感，开始了中国知青文化的研究。我们原生态的回忆、探讨，不是为了寻找或者建构一个标准答案，恰恰相反，我们用“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行动，就是为了证明：关于中国知青的研究远远没有穷尽，我们求索的，不是对我们青春的粉饰或者改写，我们追求的，不是一个简单的答案，而是勇于正视自己过去的过程，这个过程比结果更为重要，哪怕这样的正视是痛苦的，甚至是需要付出各种各样的代价的。而敢于担当的历史责任感，正是无数革命先驱们共同的特点，共同的灵魂，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稀缺最需要的共识与精神。

今天大家见到的这个再版本，基本上保留了出版的原貌，增添了个别的新的篇章。感谢武汉大学出版社，给予本书再版的机会；谨以这样原生态的回忆录呈现给今天的读者，同时，用行动表明：武汉的知青，曾经有过的青春，时至今日，依然年轻。

2013年5月16日于汉口

难忘知青岁月（代序）

胡发云

三十年前，在那一次拔地而起的风暴中，数以千万计的少男少女，如蒲公英那白花花的绒伞，从一个又一个城市，被卷到遥远又陌生的边陲、大漠、平原、山乡……落在那些寂寞的泥土中——在那之前，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在做着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英雄梦、渺渺茫茫的读书梦或朦朦胧胧的爱情梦。他们得到了一个共同的、注定要属于历史的名字——知青。

武汉是我的故乡，是数十万后来成为知青的少男少女的故乡，是我们童年依偎嬉戏的地方，是我们少年读书成长的地方，也是我们被卷进那场风暴后兴奋、彷徨、痛苦或思考并且日夜与之相伴的地方。这儿有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邻居、亲戚朋友、老师同学，有我们从小便熟悉的公园及我们曾在那儿做过童年游戏的街头巷尾老树古墙空地，还有我们的课桌、教室与操

场……那一天，我们告别了这一切，告别我们熟悉的城市，熟悉的人生，去过一种艰苦的陌生的望不到头尾的农耕生活，用我们脆弱的肩，扛起突然降临的沉重命运。

因我们的离去，这座喧闹的城市一下变得冷清又衰老，像一场战争劫掠之后。

与许多大都市的同学们不同的是，我们不是集体地被搬到农场、林场、牧场或橡胶园中（这些，我们在近些年的小说、电影、电视剧中已读到了很多），而是被抛撒到社会的最底层——中国的农民之中，真正实践了那一句最高指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夜之间，我们失去了多年来生存其间的“集体”，变成了自耕自食的“自然人”。与地老天荒相守，与鸡鸣狗吠为伍。许多男孩子、女孩子，甚至是一个人，度着漫长的寂寞与劳苦。

紧接下来的便是与我们朝夕相伴的稻田棉田、水库水渠、鸡舍猪圈、土屋油灯、酷夏的烈日、寒冬的朔风、被雨水淋得发黑的草帽、被汗水浸出盐渍的衣衫、烟熏火燎的灶房和洗衣洗菜的水塘，还有劳累、困倦、饥饿，包括穷乡僻壤也不可逃避的政治争斗与倾轧，以及为生存而生出的算计、龃龉与纷争……当然，也有相互间温暖的关照、豪爽的招待，也有油灯下的苦读、田塍上的放歌、收获的欢乐，还有在那些苦难与艰辛中萌生出的惆怅又温馨的初恋……这一切凝成了我们那一段特殊的青春岁月，凝成了我们永远不可磨灭的一段生命史。

如今，当年的知青们，已经齐齐整整地走进了中年。我们的孩子

们，也到了我们上山下乡的年纪，只是比我们那时更高大更健壮更漂亮。他们和她们大约永远也不会再回到我们当初那种岁月那样的情境中去了。他们是电视时代的产儿，是伴随着一批又一批我们少年时从来未想过，也从来未见过的高技术产品成长起来的；是听着各类情感放任的港台歌曲、看着各类光怪陆离的动画片或情节委婉的连续剧长大的；而我们当初的时髦物如尼龙袜、塑料雨衣、的确良衣裤之类，已被各类时髦新品种淹没得古旧又俗气了。两代人的生活，竟会如此不同。我们已不可能想象，如果让今天的孩子们也面临一次我们当初的命运会是什么样。惟其如此，我们的经历，便具有了历史的意义。这是不可重复的一代人的经历。惟其如此，我们希望将它记录下来，让更多的知青朋友们从这些真实的文字中重新读到自己年轻的故事，也让我们的儿女们多少了解一点父母们往昔的苦难与坚韧，遗失与追寻。

数十年过去了，这其中许许多多的日子我们都已淡忘，但那些个知青的岁月却没有忘却。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生活的变化，常常会愈来愈明晰地记忆起来——我想，即便是那段日子中品尝了最多苦难与孤寂的人，也没有忘记。那不是幸福，不是富足，也不是成功的顺遂与辉煌，那是一段难以言说的生命体验，是一段我们所学教又难以解说的歌。

数十年过去了，我们的生活已发生了许多变化。当年稚气未脱、身板骨还未长结实的小伙子，已发了福，谢了顶，花白了双鬓和掉落了几颗牙齿；当年嫩生生扎两个小羊角辫的小姑娘，脸上已悄然爬上